

A BIOGRAPHY OF SONG MEILING

佟 静◎著

宋全美齡传下

一个跨世纪女性
的荣耀、梦想与幻灭

《宋家王朝》作者西格雷夫：

蒋宋美齡成了历史上最著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

她影响了两代美国人，

美国人多年来一直把她列为世界上最受欢迎最受尊敬的十个妇女之一。

她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决定，

并通过这些决定影响全世界整整三十年。



团结出版社

A BIOGRAPHY OF SONG MEILING

佟 静◎著

宋全

美传

齡

下

宋美齡全傳

· Biography of Song Meiling

第十二章
赴美乞援

宋美龄为帮助蒋介石政府渡过危难，再次来到美国求援。然而这次再也没有了鲜花，没有了下榻白宫，没有了盛大的欢迎酒会。杜鲁门总统正打算放弃蒋介石。

杜鲁门还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完全不在意的。”此后，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

但困难吓不倒宋美龄，她退到马歇尔和她姐姐孔祥熙的家里，重整“院外援华集团”，变换手法，影响美国政府和舆论，成为“院外援华集团”的老板。

一幕“哭秦廷”在美国上演

《史记》中《楚世家》曾有这样的记载：楚国伍员怂恿吴王伐楚，借报家仇。吴王出师后，楚兵大败，楚昭王出走。吴王入楚宫恣意淫掠，伍员掘墓鞭打楚平王尸骨。楚臣申包胥不忍国土沦亡，星夜奔走入秦，求秦王念二国姻谊，借兵复楚。秦王未决，申包胥立秦廷痛哭七日，不进饮食，秦王为之感动，出兵击败吴师，楚国得以恢复。

几千年后的1948年，又有一幕被人称为“哭秦廷”的现代戏在美国上演了。

已过知天命年龄的宋美龄为了夫君，也是为了挽救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覆灭的命运，她亲自出马，到美国朝野呼吁求援。只可惜杜鲁门不是秦王，宋美龄也做不成申包胥。

1947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迅速恶化，法币在夏季已跌落到三万比一美元。物价飞涨，外汇锐减，交通、运输和工业活动由于通货膨胀和战争的双重打击而陷于混乱，老百姓怨声载道，社会秩序难以维持，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北。

飞往美国去乞援。希望能像几年前罗斯福时代那样受到热烈欢迎，并得到紧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宋美龄如此寄希望于美国是事出有因的。她曾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和美国朝野保持良好关系，抗战期间，她出席美国参政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过动人演说，受到罗斯福总统非常隆重的礼遇，获得了“出色的国民外交家美誉”。

在194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蒋介石夫妇和他们的美国朋友卢斯夫妇认为纽约州州长杜威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因而把“宝”压在了杜威身上。蒋介石特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以特种“吉星勋章”，已在美国的孔祥熙和孔令杰父子也为杜威的竞选四处奔走。出乎蒋介石的预料，1948年11月7日，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蒋介石既尴尬又失望，但又不得不求助于杜鲁门。他表示希望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坚决的宣言”，以帮助蒋介石维持士气和民心。可是，就连这点可怜的要求，也被杜鲁门婉言拒绝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蒋介石同意让宋美龄再次到美国去乞援。

11月24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她访美只能以“私人资格”前去，这给宋美龄访美罩上了不祥的阴影。

11月28日，宋美龄秘密飞往美国。由于美国国会前不久刚刚给蒋介石10亿美元的军援，而且一场激烈的竞选刚刚结束，杜鲁门不想迎合卢斯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对外政策，去支持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

宋美龄对美国的冷淡感到很难过，她的一些美国朋友也感到很难堪，看到这位当年才貌出众的蒋夫人，如今处境如此狼狈，心里有些不安。为此，马歇尔于12月3日会晤了宋美龄，并与他的夫人设法把宋美龄安排在弗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此次赴美，为了蒙骗国内舆论，宋美龄还要了个小花招。由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不理解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意图和看法，往往把她的访问看作是美国政府提议的，因而认为宋的访美是美国的关注和援助大有希望的标志。当时的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就曾写道：蒋夫人可以对国内舆论说，她的仓促赴美是因为华盛顿希望她去访问。她之所以这样说，部分是为了在国内唤起希望，部分是为了说明她出访有理。这纯粹是玩弄权术。顾维钧还说蒋夫人以那种理由解释她的突然

访问美国是必然的，因为她的访问绝不能被认为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她是一位妇女，在政府中没有正式职位，但是常常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作为“第一夫人”被赋予重大使命。特别是她一到美国就下榻马歇尔家，这很容易被国内舆论曲解。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1948年秋得到了如下的口头指示：第一，蒋夫人将以私人身份访美，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中和美国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第二，她不得公开露面；第三，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第四，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第五，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结果她在美国足足待了14个月。

由于通知大使馆宋美龄到达时间的电话来晚了，结果原定的迎接计划被搞得一塌糊涂。

12月1日，宋美龄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机场。美国方面到机场迎接的，最显要的人物有马歇尔夫人，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官员伍德沃德及夫人，巴特沃思夫妇以及代表总统的白宫空军武官兰德里上校。马歇尔将军当时因病住院观察，未能亲到机场相迎。按照预先安排的顺序是，当宋美龄走下飞机舷梯时，首先迎接她的是顾维钧大使，然后是美方各方面代表，最后才轮到孔祥熙。接下来，宋美龄与新闻界代表见面并合影。

然而，飞机一到，孔祥熙一马当先冲上前去问候，结果宋美龄不得不同时伸出两只手，右手握孔祥熙，左手握顾大使，场面非常尴尬。同时，摄影记者一拥而上，抢拍献花的镜头。接着更是一片混乱，马歇尔夫人一面拽着宋美龄的胳膊走向她停在飞机旁的自己的车子，一面问她是否要发表声明，因为后面跟着一大群记者。宋美龄说“不”，马歇尔夫人马上把她推入车内。可这时宋美龄还没有跟美国官方代表正式见过面。

于是，顾维钧赶紧跑过去拦住车子，同时把美官方代表兰德里上校从人丛中拉过来，介绍给已坐在车上的宋美龄。顾维钧一边对宋美龄解释说兰德里上校代表美国总统，一边对兰德里上校表示感谢他到机场来。

由接机一件小事，不由使人有了一种一叶知秋的感觉，又仿佛预示着宋美龄此次访美不会像以前那么美好。

对于宋美龄的到来，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丝毫热情。宋美龄下飞机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正在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总统讲了不少，但没有提到中国。直到有的在场记者提出问题，他才说他要会见蒋夫人，但尚未安排。杜鲁门对于援华问题未置评论，关于派麦克阿瑟将军去中国的可能性，他断然回答“没有”。同时，白宫的新闻发布官所说的话，给人的清楚印象是他们没有制定接待蒋夫人的任何计划。可见，主人为宋美龄准备的是一条冷板凳。

很快，蒋介石给夫人打来一份电报，电文很长，文中敦促美国政府发表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并表示作为委员长的他愿“引退让贤”。

带着蒋介石的新计划，宋美龄由马歇尔夫人陪同再一次去医院会见了马歇尔将军，并与他共进午餐。宋美龄临走时，一位记者问她是否有收获，她反问道：“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呢？”（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6卷）然而，当时在场的顾维钧却觉得这次访问并不令人鼓舞，因为宋美龄的面部表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宋美龄也确实感到沮丧。第二天，她让秘书告诉顾维钧，她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尽管声明措辞巧妙，但流露出强烈的情绪而且用意明显。熟谙政治声明的人一眼便可看出，宋美龄对在医院与马歇尔的会谈极为失望。声明草稿说，她来美国未经与中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人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得安宁。她还说：“我访问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只由我一个人负责。”（同上）

后来，宋美龄又让秘书征求大使的意见，顾维钧表示现在发表声明为时过早，因为她和最高级人物的会谈还没有结束，她还没有会见总统，而且这是一个感情冲动的声明。

无论美国政府态度如何，宋美龄依旧按计划忙碌起来。在她看来，马歇尔将军是能影响总统制定中国政策的关键人物，所以她忙于和马歇尔商讨各项事务的计划。为联络感情，她应马歇尔夫人的邀请，一起去马歇尔的庄园小住。随后的几日，两位夫人白天在庄园里的菜地劳动，晚上一起谈论马歇尔将军。

宋美龄在马歇尔家住的这阵子，与马歇尔夫人一起下厨，一起在偌大的花园摘花、剪枝；两位夫人的话题都是以马歇尔为主。马歇尔夫人向宋美龄介绍了自

己丈夫的大量生活轶事，她透露说，马歇尔小时候有一撮头发老是盖住前额，因此养成快速甩头的习惯，大家就叫他Flicker。马歇尔于12月7日开刀，宋美龄到医院看他好几次。有一次，宋美龄写了一封长信给马歇尔，信封上幽默地写着：

“送呈Flicker将军报告。极机密。阅毕即毁。”在这封长信中，宋美龄尽情撒娇，说她在在他家花园做苦力，而他则“躺在丝绸床单上”享受，又说她费了极大的力气种植“荷兰种的大口径水仙花”，并且“除草以防霜敌”；经过这些“令人腰酸背痛”的工作之后，又在厨房“度过悲惨的时刻”，“削马铃薯、煮罐头牛肉、发明了了不起的新沙拉，尝起来味道像泥巴——在密集战斗中肯定可以困扰敌人”。

在信中，宋美龄说她一再以“一介小兵”的身份，向副总司令（马歇尔夫人）要求加薪，却总被当作耳边风；她反而指责“小兵”在此宿营后，两颊晒黑了，肤色好看了，腰围亦显著加大，所以她表示任何有关财务上的要求一概无效。然而，那个“小兵”认为副总司令的答复既不民主，亦欠公正，且有歧视之嫌；所谓肤色好转也许是因结核病而泛红，体重增加可能是患有水肿或是不健康的暴饮暴食症，亦即举世皆知的“大肚子”毛病，这必须加以留意。“到底有无公正可言？”以“小兵”自居的宋美龄向马歇尔喋喋不休：“现向总司令提出SOS讯号，赶快撤离丝绸床单！甜蜜的家庭绝不是像这个样子。小兵请求上天对如此非中国式的招待予以作证。我的好友家用调温器经常胡搞一通，忽冷忽热。



马歇尔夫妇因在华期间曾得到宋美龄的热情款待而与其成为好朋友。但此时，再好的朋友也帮不了她的忙了。

我要求国会立即按照康纳利参议员的指示关照此事，因有人在清教徒妈妈的土地上做奴工。”

马歇尔看完宋美龄的长信，不禁大笑，并回信给宋美龄说，他绝不会让第三者看到这封信，不然会损害她的“中国皇后”的名声。

有人评价说，从这封看似游戏文章、字里行间却流露真情的信中，可以察觉宋美龄与平时不苟言笑的马歇尔，确实存在超乎一般人想象的交情。常被批评者形容为中国最专横、傲慢的“第一夫人”，竟会写出如此融合情爱与娇嗔的信函，而且对象是国民党当

局视为失去大陆的祸首马歇尔，一方面，固然显示了宋美龄能够把私谊和公事分得一清二楚；另一方面亦突出了在众多近代美国军政要人中，宋美龄独钟情于马歇尔一人。

宋美龄在马宅长住了两次，马宅客厅所悬挂的名贵大壁画，即是她送的。之后，宋美龄还在她的纽约公寓请马歇尔夫妇吃饭，饭后同往百老汇欣赏《南太平洋》舞台剧。（参见林博文著《跨世纪的第一夫人》）

临到珍珠港事件周年纪念日，宋美龄又要抛头露面了，她草拟了一份纪念声明，准备参加12月8日“美国援华联合总会”华盛顿委员会举办的义卖活动。

12月8日，义卖会如期举行。对于宋美龄的出席，亲蒋的美国人都到入口夹道欢迎。让宋美龄未料到的是，主办者竟突然在扩音器前讲话感谢她的光临。因为事前没有答应讲话，所以，虽然宋美龄很感吃惊，但还是很快走到麦克风前即兴讲了几句很得体的答谢词，并赠锦缎一块参与义卖。随后，宋美龄就马上离开了义卖会，因为她对乞援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美国民间义卖会并无大的兴趣。

此时，宋美龄关注的是刚刚上台的杜鲁门总统及其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因为从一踏上这片土地，她就不断得知，白宫的新主人对华态度非常暧昧，尤其是顾维钧告诉她，近期召开的美国内阁会议上，对中国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原因是在会议上号称中国问题专家的马歇尔说话最多，很显然他对内阁很有影响，特别是杜鲁门总统过于钦佩马歇尔，当然不愿与马歇尔及国务院意见相悖。所以，宋美龄又一次感到华盛顿局面的关键在于马歇尔。

这位美国五星上将出身的国务卿可以称得上是个“中国通”，他之所以能左右总统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因为他曾在1945年奉命到华调停国共矛盾，劝说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去当官，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的所谓联合政府。但是，从不轻易认输的将军却没能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找到满意的答案。尽管蒋介石对他毕恭毕敬，宋美龄也对他敬爱备至，可是他向中国提出的政府要对政治、财政和军事做重大改革，减轻人民痛苦等许多建议，既未被拒绝也未见实行，使他对蒋介石政府大感失望。

凭着与马歇尔的老关系，宋美龄自信地认为，等到将军身体恢复健康后，与他继续会谈，通过她的努力，会使他了解建议不被采纳的原因，马歇尔一定会改



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想在中国支持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所以对宋美龄的来访只是敷衍了事。

变看法，重新恢复援助蒋介石政府的努力。

宋美龄原来想，她比蒋介石对马歇尔一家人和美国更为熟悉，由她亲自出马把蒋介石和马歇尔之间在中国发生的误会解释开，并向国务卿力陈中国局势的严重性，而中国局势最终会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利益发生重大影响，这样做也许能促使国务卿采取积极的行动。这就好像指望一位美国的国务卿能够如同中国的委员长一样，在美国贯彻其个人决定。但实际上，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要做出重大决定必须以广泛的支持为基础，不仅要得到华盛顿和国会的大多数政治领袖的支持，而且要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

顾维钧深为蒋夫人的“哭秦廷”所感动。他说：“这是中国进行的一项艰巨工作，夫人承担这项工作很有勇气，充满爱国热忱。”宋美龄则说：“当我看到我们的士兵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与献身时，我感到承担这个工作是我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卷）此时此刻，为了外援，为了夫君摇摇欲坠的统治，这种任务也只有宋美龄才愿意承担并且能够“胜任”。

为了完成此行的使命，宋美龄可谓是费尽了心机。她在华盛顿等了十天，终

于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召见消息。

在官方场合，宋美龄的到来，显得非常尴尬。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少数同意帮助蒋政权的人，对她的要求表示同情。

白宫这一次接待与五年前的那一次热情欢迎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了白宫过夜，没有了国会演讲，也没有了周游全国。尽管她还是“第一夫人”，可华盛顿对她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宋美龄有些愤愤不平，其实，她应该明白，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反法西斯战线的主角变成了发动内战、涂炭生灵的罪魁，必将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所唾弃，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帮他改变他与他的政权的这种失败结局。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夫妇约见了宋美龄及陪同前来的马歇尔夫人。杜鲁门夫妇对她很客气，但也很冷淡。在茶会进行了半小时后，杜鲁门显得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走进他的书房，再给她半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宋美龄旧话重提，她认为就稳定中国局势而言，刻不容缓的是美援，她希望要求美国政府能允诺三件事，即总统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政策声明；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工作；增加援华军用物资。

杜鲁门总统很客气地听完宋美龄陈述中国的情况，但却没有给她任何让人乐观的许诺。杜鲁门说：“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宋美龄面子，而且事后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介石政权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

就这样，宋美龄白宫之行匆匆宣告结束。当记者问她是否有好消息或者她是否将再次会见总统时，这位蒋夫人冷冷一笑，神色严峻地说，这要由总统来回答。很显然，从宋美龄的言谈举止中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事隔不久，美方就表明了态度。在国务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当一位记者向杜鲁门总统询问蒋夫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总统很不客气地答道：他不知道蒋夫人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可见，杜鲁门总统并不想去支持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使“华府”

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相信，蒋介石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不得不见风使舵了。

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杜鲁门还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此后，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

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太保守了。1949年5月，也就是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的几个月，杜鲁门听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机密，直到1983年即35年以后才销密，而且仍然有所保留。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美国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千万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626页）

不久，美国政府发表了著名的“白皮书”，指责中国国民党腐败无能。宋美龄愤怒地离开华盛顿，又无颜归国见“江东父老”，便再次隐居到纽约里弗代

尔独立大道4904号的孔家别墅里，直到1950年1月返回中国台湾。从此，她再未踏上中国大陆。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就任总统、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宋美龄落魄白宫，痛感世态的炎凉。可更让她沮丧的是：华盛顿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举李代蒋的换马计划。宋到美刚一个多月，蒋介石便被迫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中国的第一夫人随之易名。

宋美龄乞援没有丝毫进展，

她不找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被人民所唾弃这个根本原因，反而把“罪过”归于有人泄露了她准备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要求。因此，她向顾维钧要求了解消息是怎样泄露的，她要知道谁把这三点透露出去，使她与总统会谈那样为难和那样尴尬。蒋介石也密令外交部调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打字员泄露重要情报的情况。

一时间，中华民国驻美使馆兴师动众，又是调查，又是开会。顾维钧还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目的是教育管理机密文件的人员特别提高警惕。大使馆还提出新的保密措施，特别是关于密码电报的保管、分发与传递，密码与其他保密文件的缮打和向大使馆馆员分发，以及对中外人士的谈话等，都制订了细则，以确保大使馆机密文件的保密。

其实，对于所谓泄密问题，顾维钧早已向外交部做过解释：美国驻华大使馆曾将此消息告诉过《纽约时报》的记者利伯曼，利伯曼当即向他的报社发出报道。时至宋美龄访美，《纽约时报》又旧事重提。此外，这些消息通过其他来源也登载过电讯、传媒，这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早在宋美龄赴美之前，已为人所知。时至今日，驻美使馆也不想当这个“替罪羊”。

宋美龄的美国之行宣告失败，美方国务院发出声明：“美国驻华外交代表与军事代表将最新消息随时向美国政府详细报告。”（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卷）这已暗示宋美龄没有继续留在华盛顿的必要。顾维钧也通过秘书转告宋美龄说，某些接近马歇尔家的美国友人劝告蒋夫人搬出利斯堡马家，而不要逗留到不受欢迎的时候。同时，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介石建议，既然夫人已经见到杜鲁门总统，委员长应即嘱她回国。可是蒋介石回答，蒋夫人已打来电报告之马歇尔夫人挽留，在马歇尔住院期间，不能丢下她离去。而且她认为马歇尔可能会有所作为。事实上，这种挽留不过是马歇尔夫人为了给这位夫人不成功的访问留些面子而已。

此时，宋美龄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她把自己局限在她的亲戚和亲信的小圈子里。为了不使这位“第一夫人”空手而归，太丢面子，她的“军师”们又给她出谋划策，另辟蹊径。他们根据军援的情况，讨论了1945年价目表的原来计价，按此计价就可以全部完成七军三师的装备计划，而如按重置成本的现行价格计算则只能完成计划的一半。某人也曾要求按1945年



这是蒋氏夫妇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的合影，半年之后则人事皆非。

设法使宋美龄不空手回去，否则她无法“交账”。

在此期间，宋美龄锲而不舍地于12月27日又去拜会了代理国务卿洛维特，目的仍然是“重申以前的援华请求”。但是，美国方面充其量只是表现出一种“同情地倾听”，而没有做任何有实质性的答复。

其实宋美龄访美失败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当她离开南京时，援华的谈判早已在华盛顿、南京和巴黎进行了不短的时间，美国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各项要求已经予以详尽讨论。美国的态度和政策显然是坚定不移的，虽然其中一个问题即迅速装运援华物资，在华盛顿和巴黎有些进展，但对其他要求，美国均予以坚决拒绝。据蒋介石夫妇看来，这都是根据马歇尔的意见行事的。所以宋美龄访美的重点是马歇尔而不是杜鲁门。尽管拜会总统以使他了解这些问题并直接向他请示美援是必要的。但无论如何，进一步的敦促也不可能改变美国的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事实上奠基于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战局急剧恶化，

的价格计算，但显然是难以获得马歇尔的允诺。另一个意见是要求提供海军飞机、轰炸机和PB—4Y飞机，换句话说，由于原协定的未支付部分已无货可供，“军师”们出的主意是要求美国政府以现金而不以维修器材付与中国。但顾维钧指出，美国国会不拨款，美国政府是弄不到现款的。最后，

“军师”们又建议要求美国为其在中国修筑各飞机场支付8000万美元。顾维钧说，这个关于飞机场的具体建议是行不通的，而只会激怒美国政府。

“军师”们回答说，他们急于

其恶化的性质远远超出了预料之外，不仅更令人失望，而且也进一步捆住了华盛顿的手脚，使之难以提供迅速而充分的援助。此外战局的情况还必然使马歇尔感到他是正确的，并使他有理由说：“我早就说过是这样。”无论宋美龄做何解释也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必定正视中国的现实，当美国政府特别是马歇尔感到中国局势已发展到美国无能为力的地步，而且在宋美龄访美之前，这种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美国人当然不会给她任何许诺。

那么，宋美龄访美的幕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人士曾经盛传，宋美龄来美其实是为了个人原因，敦促美援的使命只是借口。这些原因有：其一，宋美龄与蒋介石发生口角，蒋介石从沈阳回到南京，为时局担忧，把美国的态度归咎于宋氏家庭；其二，避免被共产党俘虏的危险，为她个人的安全；其三，孔家和她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曾在美国大做股票投机买卖，指望在共和党获胜后哄抬价格，结果大赔，她来美是为了收拾财务上的烂摊子。

即使排除上述传闻，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通过各方面的渠道与美方联系、会谈与试探，已经十分清楚地了解了美国对华态度。宋美龄还要在最后时刻前来访美，难道她不考虑其得失利弊以及成功的可能或程度吗？此时，宋美龄为了“党国”确是大有孤注一掷的味道。

然而，中国国内的军事形势恶化之快是宋美龄始料不及的，1948年11月，东北失守，接着共产党的军队开始围困徐州。在国民党内部，主和派逐渐壮大，蒋介石面临政府更迭的强大压力。

尽管如此，宋美龄在已经知道很难获得成功的情况下，为拯救“蒋家王朝”，义无反顾地踏上出访之路，又锲而不舍地为“蒋家王朝”在美“哭秦廷”长达14个月，就这位“第一夫人”个人而言，这的确是一种“爱党国”行动。可是，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一种螳臂挡车之举。

“院外援华集团”的后台老板

宋美龄访美不成功，她离开了华盛顿，但并未离开美国。宋美龄的命运是与

“蒋家王朝”联系在一起的，保住蒋介石的地位就是保住了自己“第一夫人”的利益，所以她继续为美援奔波着。这一次的手段不是在台前表演她的外交才能，而是在幕后当老板，亲自指挥一批从蒋介石那里领取薪金的代理人所组成的美国“院外援华集团”（又被称为“中国游说团”）。这个集团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左右着美国对中国海峡两岸的政策，曾经发挥了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6年以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为代表的50名众议员就苏联阻碍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一事，在美国发表《东北宣言》，陈述美国立场。“中国游说团”这个字眼首次非正式出现在美国报纸杂志上。（参见《我为中国而生——周以德的一生及其时代》）它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特殊产物。

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它的核心是一伙财源充实的中国国民党官员；它的外围是一群美国右翼政界的核心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甚至到60年代这两部分人为了共同支持蒋介石及他的重返大陆的大目标彼此合作着，曾在美国社会形成了一股援蒋的政治势力。他们最初的做法是利用金钱介入美国选举，“助选”的对象，总统锁定在共和党，参众议员不分党派，只要是坚决反共、认同“中华民国”的候选人，皆可获得政治捐款和其他资助。拿了“台湾钱”，当然就要为台湾说话了。

“院外援华集团”“内部核心”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40年夏季，当时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来到了华盛顿。宋子文的任务是为同日军孤军奋战了三年的中国政府谋求美国的援助。宋子文创办了他自己的公司，重金聘用了一些有影响的美国人。宋子文有一次对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事实上，你们政府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在三天以内没有不知道的。”（〔美〕罗斯·Y·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40—46页）宋子文于1943年才离开美国，相信他与许多政客和政治掮客建立的联系，对后来的“院外援华集团”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在宋子文离开以后的这段时间内，华盛顿已经不需要中国说客了。罗斯福总统坚定地相信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此外，他已开始定期把美国高级官员派往重庆。设法使蒋介石相信，他的利益正在得到维护。这期间，宋子文在华盛顿刻意结交的一些“朋友”已陆续进入美国政界的一些重要岗位。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忽视充实他在美国的办事机构。很快他就派他的亲信陈之迈到美国负责宣传工作。而后，陈之迈成为重振“院外援华集团”的关键人物。1948年夏季，孔祥熙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定居在美国，显然也承担了为蒋介石谋求更多援助的使命。宋子文、陈之迈和孔家的工作，为宋美龄建立有影响力院外援华集团帮了大忙。

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援助国民党政权态度不够积极，蒋介石派驻在美国的一些代表，亦曾在各方面进行游说努力，希望造成杜鲁门在1948年总统大选时失利。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派来了亲信陈立夫出访美国，陈交给当时正在再次竞选总统的纽约州杜威州长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并与之进行了密谈。随后不久，陈立夫回到上海，《新闻天地》就发表了下列消息：

“杜威州长竞选为美国总统，似有操胜券之势……据陈副院长立夫云，如果杜威当选，则将采取特别措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杜威在1948年大选中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失望，特别是当杜鲁门政府于大选刚刚结束之际，就开始认真地重新估计整个援蒋计划时，蒋介石更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应该说，这些事态的发展成为促使宋美龄于1948年12月1日重返美国的部分原因之一，同时这些事态也是导致“院外援华集团”在随后几个月中整顿和扩大的原因。

宋美龄亲自领导“院外援华集团”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市里弗代尔区她的姐夫孔祥熙的家里。她同各种团体的中国人举行“每周战略会议”，这些人在美国政坛进行有效的活动。这些人有的正在国民党中做官，有的是先前当过官，或是有大量财产的富翁。往往是一个人就具备上述两种优越条件。据知情者说，参加会议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人包括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内，在纽约市内或者从纽约向外开展活动，其中多数为富豪，却不担任官职。另一类人在华盛顿工作，由蒋介石最信任的代表团领导人组成，这些官员包括中国驻世界银行的代表俞国华、驻美国使馆的武官皮宗敢、国民党空军购料委员会驻美办事处主任毛邦初以及陈之迈等。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人独揽军政大权。这时，虽然李宗仁已经“代行”总统职权，但宋美龄、使馆官员和代表团的其他负责人仍然直接向蒋介石汇报。